

## 先生的心事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唉——。”

正月十五日晚，先生一声重重的叹息和紧接着的翻身把熟睡中的我弄醒了。黑暗中扭头一看床头的钟，半夜一点半。从年前起先生就这样整天唉声叹气，两个多星期了。说起来我先生来美三十年，先是读博，再在大学求职，当了教授又面临终身教授评审，其间还帮助来美国陪读的我学英文、找工作、一起带孩子，遇到过不少沟沟坎坎，可像这样好多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还是头一回。想到这里睡意正浓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开始为先生担心起来。我知道，他这又是在为陈妈妈的事烦心了。

先生中学时有个同学叫进生，陈妈妈就是进生的母亲。对一般人来说中学同学的母亲也许是位少年时代见过几次面的长辈，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吧。可是先生几十年来一天都不曾忘记陈妈妈，因为陈妈妈是他一辈子的恩人。

我和先生是在大学期间恋爱，毕业后结婚的。我的婚姻与闺蜜们的婚姻有一点大不一样。闺蜜们婚后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与婆婆有些矛盾。有的闺蜜嫌婆婆没有文化而白眼相看，有文化的婆婆呢闺蜜们又因下一代的育儿理念与之不同暗中斗气，还有的闺蜜抱怨婆婆天天看电视影响学龄前孩子的教育甚至引起邻居们的议论。在这点上我的婚姻风平浪静，压根儿没有婆媳关系问题——因为我婆婆在我认识先生前已经去世了。

我先生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夕因为怕杀头先生的父母从河南农村老家逃到武汉，并隐姓埋名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解放三年后我先生在武汉出生。先生六岁时，他父亲作为逃亡地主被政府送回老家改造；十四岁时，文革爆发，他母亲也被政府送回老家改造。送回老家的父母不仅失去国营工厂职工应得的医疗、退休金等福利待遇，而且整天被罚干重活，常常被批斗，加上农村缺医少药，文革中先后去世。因此我婚姻里没有婆媳矛盾是他们家巨大悲剧的客观结果，而不是我这个媳妇应该庆幸的好运。

少年时代失去父母的依靠意味着我先生不得不自食其力。我自己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很难想象从小自食其力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一个背着剥削阶级出身黑锅的少年的自食其力更加让我难以想象。

“那些年你是怎么养活自己的呢？”和先生最初的约会开始我就常常向他提这个问题。一方面我像《奥赛罗》里苔丝狄蒙娜着迷于那个摩尔人的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了解他，看看自己和面前的这个青年到底有没有缘分结成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听到我的问题，先生往往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然后突然冒出一句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一分钱一趟”。有时候，长长的沉默后，他又突然冒出来一句——“一次三块砖”，或者“一比三比零点五”，或者“老钟”、“老唐”之类不知所云的东西。

经过多次的问答，我渐渐地从先生的只言片语中对他那些年的生存状况有了一个大致地了解。原来少

年时的先生在母亲离开后为了混口饭吃曾经天天从汉水桥引桥下把满载货物的人力车推到桥面换来一分钱一趟的报酬，后来又在于汉口武圣路口的一家工厂做了一年多的泥瓦匠小工。泥瓦匠小工的工作就是为师傅打下手，有时要搬50公斤一袋的水泥，或用独轮车运送石灰、沙、碎石和水泥，有时要从汽车上卸砖头，有时要用锹将一定比例的沙、石灰和着水在铁板上翻来覆去地拌成砌墙用的灰浆，而墙砌到

二楼时小工要把码在地上的砖头抛给二楼脚手架上的师傅。这时候少年双手紧握砖块的一头，低头弯腰让砖头穿过胯下，然后调动胳膊、腰部、背部的肌肉，利用惯性猛地向上朝蹲在二楼脚手架上的师傅抛去。师傅接过抛上来的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堆积在脚手架上。脚手架上的砖堆积到一定数量后，师傅开始砌墙，小工又不断地拉动脚手架上滑轮的链子，把一桶桶和好的灰浆送到师傅身边。听着先生的故事，我脑海里不禁一会儿涌现出列宾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拉纤的场景，一会儿涌现出麦隆铜雕《掷铁饼者》的姿态。就这样，我总算粗略地懂得了先生的“一分钱一趟”，“一次三块砖”和“一比三比零点五”的意思。至于“老钟”、“老唐”这些话，我至今仍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先生自食其力的这段时间，他和进生的关系迅速从一般同学发展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无学可上的全国青少年都面临如何打发一天天时间的问题。红卫兵“大串联”结束后，北京青年遇罗克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痛斥把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打入另册的臭名昭著的血统论，长沙学生杨小凯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他的忧国之情，武汉也有学生关心造反派组织“工总”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武斗，不过多数学生要么热衷于养金鱼、斗蛐蛐，要么开始学笛子、二胡之类平民买得起的乐器，还有的打架斗殴。很多女同学在这段时间学会了烧菜做



▲ 进生（左一）和陈妈妈到车站送我先生出国，前排为进生儿子和我女儿

饭，而很多男同学则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抽烟喝酒。因为必须每天打工，我先生没有参加同学的活动。他的缺席引起了以前经常一起玩耍的同学们的注意，于是家住附近的进生和他母亲得知了先生家的变故和先生的处境。陈妈妈让进生和先生一起去汉水桥推人力车，不是为了赚那几分几毛钱，而是怕儿子无所事事学坏了。于是，他们两人开始早出晚归去推车，每天挣个两毛、三毛的。那时候武汉的早点发糕三分钱一块，油条五分钱一根，面窝五分钱一个，热干面一毛钱一碗，萝卜、白菜三分钱一斤，豆腐两分钱一块，推车挣的钱居然可以让先生勉强糊口了。后来先生有机会在武圣路口的一家工厂做泥瓦匠小工，不久他把进生也介绍和他一起做小工。两个15、6岁的少年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知识，却过早地开始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闯荡。我不知道当时这两个少年每天在一起想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画家、作家兼诗人木心在那个年纪因为和茅盾的亲戚关系读遍了大作家的藏书；比先生小两岁的历史学家高华文革期间偶然在南京九中的仓库里发现大批中外人文古典，开始了他“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先生和进生没有那么幸运，他曾告诉我他们那时一起读的就是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红岩》等小说，另外他们学会了识简谱，还学着拉起了二胡。

(下接第B2版→)